

吕若涵 著

反讽 与 渴望

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岳麓书社

吕若涵 著

反讽与渴望

FANFENG YU KEWANG

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PINGPING DE DOWEIHUYU KONGJIAN

◎ 本书出版得到福建省财政厅专项经费资助

C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岳麓书社 ·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讽与渴望:现代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吕若涵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2.3
ISBN 978-7-80761-831-7

I. ①反... II. ①吕...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
—现代 IV. 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666 号

FANFENG YU KEWANG;

XIANDAI SANWEN PIPING DE DUOWEI HUAYU KONGJIAN

反讽与渴望:现代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

作 者:吕若涵

责任编辑:杨云辉

责任校对:刘海英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 http://ylbooks.taobao.com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4.87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7-80761-831-7/I·1035

定价:29.00 元

承印:长沙利君濠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代序：建构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

散文批评或散文研究的“话语空间”，若简约视之，就是三足鼎立的结构，这一点或与其他文类并无区别：散文的名家名作与流派、现象，散文史的叙述与言说，散文文类与文体理论研究，三大支柱撑起了散文研究的这片天地。当然，这种大致划分无非删繁就简，欲展示一个为文学研究者所认可的相对稳定的轮廓与框架。换言之，由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本批评构成的文学研究空间，同样适用于散文的研究。

在相对稳定的文学研究空间里，有着多元的、繁复的、不停地变化着的批评话语在生成，演变，发展，动荡与扩张，人们喜欢引用古斯塔夫·吕德勒所罗列的文学研究的“九大目标”：

1. 作家研究，研究作家的生平、遗传、气质、性格、教育、文学养成、事业等；
2. 单独的作品研究，研究个别作品的来源、起因、历史、结构、性质、意图、作者的含义、文类、时间及流传、影响等；
3. 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研究，综合个别作品的结论，总体评价天才及其演变，与已存和同时的作品之关系、影响等；
4. 作家团体和流派研究，流派的理想，产生的原则，历史的原因，形成，发展及衰亡，个别作家在流派中的地位，与集体理想之间的关系，更新的契机，矛盾及下



一个流派的产生，与时代的关系，竞争及延续的原因和法则；5. 流派的团体和断代的研究，研究区别及共同的特点，与总体文明的关系，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道德的、宗教的相似与不同，它们的法则和集体的心理；6. 断代的团体及文学的总体研究，研究其起因、发展、成长、丰富、扩大、变化、延续，相似与不同，民族心理；7. 不同国家的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研究交流、影响、欧洲及世界的潮流，相似与不同，原因与法则，民族心理；8. 作品的系列与文类研究，研究起因、构成、发展、伪造、衰退与死亡，原因与法则；9. 思想与运动研究，研究人道主义、进步、理想、异国情调、为艺术而艺术等，性质、发展和死亡等，原因与法则等。^①

这“九大目标”，即便今天看来已颇为保守和传统，即便今天已经有了更多名目的研究目标和新理论，但还是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了文学研究空间里那特有的张力和无限的能量。同样，在散文研究空间里，散文批评中各式话语的形成，研究视角的改变，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理论思维的拓展深入，以及人们对“散文特质”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不同认识，也将决定这个批评空间是否多维、立体、丰富、独特且富于变化，是否已经渐渐形成欲取代旧传统的“新传统”，变得稳固或平衡；或者，仅仅只是因为其中一些维度的改变，致使曾经稳定的空间相应地发生着改变。

在此，有必要回顾现代散文批评的发展历史。中外散文研究总

①古斯塔夫·吕德勒：《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技巧》。转引自郭宏安著：《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第254页。



是从作家研究起步。如果参照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批评类别，中国现代散文的批评空间里也存在着“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在现代散文发生发展的前三十年，散文批评的整体情况大致以报刊上即时的批评为主，读者们，专栏作家与学者们，尤其是周作人、鲁迅、林语堂、胡适、郁达夫、朱自清、梁遇春、沈从文、阿英、茅盾等等，他们既是散文大家，散文作家，同时也是散文的自发的、即时的批评者，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和品评趣味成为现代散文批评的奠基者，奉献出一份份经由自己的知识、才智、趣味、美学偏好所打磨出来的充满个性和思想深度的理论文字。当我们阅读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们写的各种序跋、书评、小品文、杂文时，我们会陶醉于那些感性而优美的批评文字之中，并直接将之归入文学创作之中。它呈现出了散文这一文类与其他文类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批评文字本身就是关于书籍、历史、文化、文学的思想或文艺随笔。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在个人风格、美学个性、所呈现的历史与美学的逻辑形态上恐为今人难以超越。学者/作家的即时批评伴随报刊的发展而发展至今，它们见证了刊物与散文繁荣的密切关系。这样的批评与正襟危坐的学院派成果很不一样，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学素养，却又努力避免过于学究的气息。其中不乏带有文学素养和专业训练的学者阅读介绍品评的随笔式批评，有书评、文评、作家文集的序以及专栏批评，真正能将自己的阅读个性、阅读品位表现出来的，它们或是散文创作者自身的体察与阅读笔记，或是识得历史与传统并将理论化至无痕的学者批评。这类文章无须广征博引，无须引文必作注释，而以才气灵气，以其活跃、灵敏、生气勃勃与个人趣味取胜，留下了“当日”“当下”的各种印迹：“这种批评符合当日的精神、当日的语言，带着当日的气质，带着令人愉快地



迅速地读完所必须的一切，它所表达的是当日的思想，但形式却变幻无常，给人一种新思想的错觉，并力图避免一切学究气息。”^①那些由序、跋、书评或专栏文章汇集成的散文批评文字，那些由写作者与批评者之间发生的对抗、辩论或讨论，其内容包括了对现代散文概念、文体命名和文体特征的辨识，对各个作家风格独具只眼的解析，对现代散文源头的回探，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比较，甚或是对期刊格调和专栏个性的优劣评判，都已构成与现代散文创作等量齐观的风景，且成为现代散文研究空间里最具活力、灵动而富于创造性的一类。因此，批评家们总是强调，优秀的散文批评本身，也可视作好随笔好散文，一个批评家的宏观视野与微观审美能力能在此得到检验：是否具有独特的美学意识，是否有着犀利的理论视角，是否能够发别人所未发，是否能知微见著等等。

现代文学中的即时批评，以作家或散文大师为主体的批评，较之学院派批评似乎更能快速地对散文创作现象作出反应、进行指导，这与现代散文出现与发展的时间不算太长有关，带有一定学院派特点的职业批评虽然有，却相对单薄，它需要随着大学里设置起相关学科才能渐次发展起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人们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所作的一次整体总结，因此，同期出现一批第一个十年散文整体观的著作或教材、提纲，就显得顺理成章。《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等，引导人们认识散文某个发展阶段的总

①[法]蒂博代著：《六说文学批评》，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60页。



体特征，使原本感性而富于才情个性的文学批评转向对散文发展脉络、传统和源流的探讨，关注起文学史的横向与纵向的错综。此时还有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样一种以古今文学中的“载道”与“言志”此消彼长的规律来揭示现代散文的“源头”的长文，它的“立异恐怖”（钱钟书语），对于三十年代散文创作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长长短短的散文作家论在三十年代也大量出现，并进入大学课堂，为散文史论提供了经典作家的选择范围。学者们、作家们对散文创作现象的描述、综合、透视，对种种流派与风格的理论归类，对作家创作得失的剖析与批评，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提升与总结，对外国散文理论的译介，渐渐构成散文理论的渊薮，形成最早一批的散文研究的理论话语。当然，总体来看，三十年代现代散文批评和研究，多是零碎的、仓促的、片段的，少有系统的理论，因此，对于总是处于理论饥渴和体系崇拜的研究者来说，不免要发出散文理论资源匮乏的感叹。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学科迅速发展，学术规范也日益明晰，研究型话语渐渐成为散文批评中的主流。散文批评空间日渐变得客观、严谨，逻辑性、学理性强，“职业批评”开始在现代散文研究中成为主流。文本批评、文类理论、散文史（或史论）构成了立体的研究空间，形成散文研究最基本的结构。以散文作家（一个或一群）为主的研究，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作家论”——事实上，选择一个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名家（不排除他还有小说家、诗人等其他身份）作为研究论题，往往意味着，可以最大程度地借镜其他文类的理论，各种美学理论或文化研究理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作家创作进行解读。其次，虽然散文研究的理论形态多种多样，但审美和文本的批评与社会和文化的批评，始终构成这个批评空间最重要的两支，它们互有矛盾，各有侧重，同时也互



相兼容，难分难舍。

正是契合作家作品批评、理论话语研究和文学史写作这样的批评空间结构，一批扎实严谨的研究成果适时出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俞元桂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苏州大学范培松先生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都是新时期后较早出现的也较为扎实和宏观的成果。各种系列的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和作家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各种中外散文创作与理论研究资料的出版，更为今天现代散文研究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立起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平台。随后有更多的研究者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方法与所持视角各不相同，有的将三个十年里的散文作家与作品、理论建设、思潮流派一一介绍，以史料严谨，论说有据，历史线索清晰，客观而论述严密著称；也有的重视个人视角，突出一个人的历史观；有的可以是对作家散文创作阶段与历程纵横交错的铺展；也有的以点带面，凸显作家具有创造性的散文文体个性的生成过程；还有的从古今文类史的眼光进行散文理论研究……无论如何，现代散文研究与现代文学史或其他文类史研究类似，学院派研究所讲求的规范越发明显，研究者不由得从重感悟的文学批评转向严谨客观的理性阐释、从单一的作家论到散文史建构、由创作现象到理论概括、由文学批评到学术研究。

在这样一个散文批评空间里，每一个人的批评维度从来不是单一的固定的，一个多维研究空间也往往因研究者视角发生变化而产生更为立体的视角效果，整个空间感更可能因人而异，眩目多姿。因此，作家作品批评、文学史建构以及理论研究，当它们的每一部分都开始变得更为丰富时，当后来的研究者来到这样一个已经积累了数代人的汗水而建立起来的空间时，同样也会发现某些维度里存



在的空洞，看到一些支架的无力，或者发现，即使同样是那些资料，换以不同的视角，竟然也可以重新支撑起一个新的认知维度，产生所谓移步换形之感。

二

现代散文研究一如其他文类研究一样，随着这个世纪各式理论的泛滥和衍生，也滚雪球式地庞大膨胀起来，颇为纷繁壮观。学院派研究兴起之后，那种随手写下的批评文字更多地停留在报刊的读书类版面上，渐渐地淡出学院研究者的眼界，在科学的研究领域里被放逐，幸运些的则被置于随笔文学的行列里。

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多在学术规范下亦步亦趋，他们必须依照一整套学院派研究模式进行自己的科研活动，其结果方容易为学术界所接受。应该说，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与内容仍然与吕德勒上述的概括相去不远，不过，各种各样新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目标正在慢慢地调整和改变着这份名目，新批评、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媒介、读者反应、“复调”理论等新的理论资源，也确实在改变和拓展着文学研究的思路。而面对热闹的文学研究界，散文研究却一向是所有文类领域中看上去最不容易“出新”的一种，人们借用各种理论加以运用的程度远不及小说、诗歌和戏剧。因此，八十年代以后的散文研究所运用的种种方法、目标、理论，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和痕迹。九十年代以后的散文研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基础上，则与各种文化思潮、时代风尚和文学思潮的联系更为紧密。八十年代散文对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创伤”叙写，九十年代对整个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身份与角色的反省和思考，是八九十年代散



文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散文随笔，思想与思考的表达能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和广大。因此，这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知识分子心理情感和思想特征的散文文体，便走进了一个繁荣多元，尤其强调自由思想和个人自觉的创作时期。由此，研究者或批评家们在探讨此间散文创作的得失时，很容易流入文本主题和内容构成的“审美意识形态”，散文研究往往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附属性产品，甚至沦落为思考或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及其“现代性创伤”时人们频频征引或佐证的第一手资料，适时引进的西方“集体记忆”或“个人记忆”理论一下子也成为散文研究中常常运用的理论利器——而散文文体本身的价值被置于了次一级的地位。这从另一方面表明，现代散文在几十年里，实际上多是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副产品出现。文学研究者甚至不把散文作为文学创作、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而是作为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历练、思想变化或艺术选择的根据来使用，也就是说，它们可能被认为有着“史料”的意义和价值而被阅读和引用。

仔细检索一番还可发现，近二十年的散文研究，多集中于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社团研究、散文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外来影响与接受研究等几大部分上。具体地说，总是与现代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深入细致的思潮、社团、流派研究结合在一起，许多研究专著涉及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散文创作群体和创作现象，尽管众多的研究成果本身并不是以散文文体创作为中心，但人们在新青年派、语丝派、论语派、新月派、京派文学乃至海派文学的研究中，会涉及散文的文体、理论的建设以及散文内容与风格以及历史意义，研究者从中发现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基本走向、类别、理论的发展与文体的创新乃至期刊报纸在散文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意义。可以说，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带动起了对现



代散文创作风格和流派理论的研究。有的描述着曾经有过的文人结社景观，有的则出以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讨论，也有的更重视在刊物或社团中最具有个性和特点的创作成果，即使有的研究主要侧重对社团活动的展现，文学/散文创作的美学分析并不作为重点，但同样也可以丰富生动的细节来填补散文史叙述的简洁和单一。从单个作家的散文研究到具体流派研究，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主题和重点。

二十一世纪前后，文化研究兴起，大众传媒与现代中国的关系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相应的，在散文研究中也出现了期刊研究的热潮。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并改变着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知识分子与报刊的关系，文学与报刊的关系，散文与报刊的关系，虽然并不是什么新题，却可能在新的理论视角下获得新的阐释。《理念人》中，科塞认为，刊物就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刊物与知识分子的活动关系密切，尤其是同人刊物大量存在，刊物的研究可以是把刊物作为传播媒介来进行。刊物的研究，也同样可以是散文史的一种构成。现代散文期刊研究，本身就是散文研究内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也是散文研究中一个开掘还不够的部分。期刊与散文关系甚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真正从期刊生产的意义上讨论现代散文史的诸多问题，辨析它与现代文学史、现代散文史的互生共荣的研究，却还是比较匮乏的。无论是现代散文史所已经具有的脉络梳理，还是获得相当研究积累的散文作家作品的分析鉴赏和研究，若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再进一步，那么从报刊这一现代散文最依赖的媒介入手，意味着将为现代散文的生成和发展描绘出一个更为丰富、生动、互为联系的网络地图，它可以为原有的散文史叙述提供另一种叙述方式，即以刊物为主体线索，探究现代散文传统如何建立，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聚分离合以及



散文流派如何形成并在刊物上体现其“派”的特色，最后才落实到散文与其载体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影响甚大的散文期刊，相对于其他文学刊物而言，当然有着属于自己文体的特点，现代文学中的艺文刊物往往都有散文一席之地，这本来就是散文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一般的文艺性刊物里的散文，其文类位置往往被淡化和边缘化，有时会成为刊物中无足轻重的点缀或版面的填充物。而专门的散文期刊的出现，意味着文类的自觉意识和理论的自觉意识的发生与发展：由于散文编辑往往就是散文文类的爱好者、写作者，散文创作可能在当时已经为他们建立起了文坛上的影响力（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等），因此，当他们倾力于主持或扶持一个刊物时，常常能够以自己的理论主张，为流派的形成、文体意识的生成、散文新生力量的培养等打开一方天地，创出新的局面。而有特点的散文期刊，也因其同人们的个性，成为某个文学群体的重要生活场所，成为其生活与思想的记录与反映的载体。

因此，现代散文期刊，体现出比其他文类刊物更明显的承传与代续特点。尤其是《语丝》的创刊，如舒芜所说，它的传统“一分为二”，一条由三十年代北平的《骆驼草》，到1932年9月创刊的《论语》以及后来的《人间世》《宇宙风》及当时出现一批林氏期刊的“旁系刊物”延续下来；另一条是左翼的《太白》《杂文》《新语林》以及《鲁迅风》《野草》等。尽管抗战后刊物分野严重，但沦陷区北平和上海的散文刊物，大后方各种文艺副刊上的散文部分，抗战后复刊或新创的散文刊物，也几乎可以纳入这两条线中，当然承传中有变异。而人员的聚合，题材的延续，话题的重提等，丝丝缕缕地牵扯不清，知识分子的心绪与情结，在时代巨变中一览无余。值得深味的是，周作人作为最重要散文家，不仅在各个散文



刊物中或参与编辑或者开辟专栏发表文章，而且对同时期的散文刊物，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说在中国现代散文期刊上，渐趋发展出“周派散文”的创作群体，并不为过；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自己当年提倡闲适一路的散文：“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夹注：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那么从期刊史上是可以看到这两条路径渭分明的走向，并且可以发现，还有些作家在不同的思想阶段，对两条路自有抉择。这个承传与代续的特点，也可以从刊物编辑人员及编辑理念上看起来。由此想来，如果以“中国现代散文期刊史论”作为研究课题，也是大有可为的。只要稍加列举，就有《语丝》《骆驼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宇宙风（乙刊）》《文饭小品》《逸经》《天地人》《西风》《水星》《太白》《新语林》《涛声》《芒种》《杂文》（质文）《鲁迅风》《野草》《古今》《风雨谈》《天地》《人间》《人间味》《天下》等风格不同、流派不同的刊物，可谓洋洋大观，它也可以成为散文史的另一写法。

此外，从文类角度看现代期刊也颇有意义。散文期刊的大量出现，助长了现代散文文类的扩张性，如果我们将《新青年》以降的《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或《独立》《观察》等看做是以论说文为主导的综合性期刊，以《语丝》及其后大量的文学散文专门刊物看做是集散文的议论、抒情、叙事乃至虚构为一体的文体性鲜明又多样的散文期刊，那么两条期刊发展的线索都与大众读者有着错综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演说文章与诗意、文采与科学、逻辑与感受、知性与抒情性、真实与虚构等等，不仅仅是散文技巧的运用，也是期刊面对假想读者的出版战略。



三

文学史或文学史论须建立在具体的、微观的、感性的、丰富的、细致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基础上，也不排斥将个人的鉴赏品位带入文学史中。但在微观品鉴与宏观观照中，理论将可能成为一块磁石，使每一粒细沙归位；理论也可成为一把利器，让解析与阐释者得心应手；理论的广度与深度，可能用自身的灰色反射出文学的多彩，以自身的抽象与条理演绎文学的感性与多姿。这就是任何时候，我们在各种诗学/哲学/史学理论面前痛且快乐着的原因吧。在散文研究方面，抽象地、宏观地进行着对现代散文的文类理论建构，对中西散文传统和散文理论继承与光大，或许成为作家作品研究与散文史研究齐头并进时，最困扰研究者又最诱惑研究者的目标。尽管心怀所谓理论体系的建构者，总是会遭至怀疑与否定，但“散文学”的命题和它那灰色的理论阴影，却随时笼罩在研究者头顶，沉重而挥之不去。

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以作家论和散文史来呈现微观与宏观、个案阐释与纵向梳理的研究为多；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理论研究则多关注于批评和论争，诸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幽默闲适小品文与匕首投枪式杂文的理论论争等；至于涉及现代散文流派、散文刊物或社团的研究，则多以社会学和文化学视角加以统摄。在理论建设方面，尽管可以看到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所做出的共同的努力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如现代杂文文体的确立、现代闲话风散文的理论辨识，周作人对韩愈式古文的批判、俞平伯林语堂等对晚明小品的赞扬、林语堂“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小品文理念以及对“西洋杂志文”的倡导，现代作家尽其心力译介日本随笔、英国



随笔等，到六十年代将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抒情散文模式大加推广总结，八九十年代着重于“大散文”和“艺术散文”的批评与探讨等等，虽然还缺乏走向纯粹或彻底的理论研究，但对中国散文理论建设和广泛的散文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十年来，一些中青年研究者有感于散文理论研究的匮乏，因此将研究触角伸向理论领域，试图从新的角度和理论思维对现代散文理论及文体进行梳理理论总结。由于学界普遍关注中国百年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众多专著大体从厘清与散文文类相关的“随笔”“杂文”“小品文”等概念入手，稍作文体辨析后再回到对现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和创作理念、精神心态的分析。少量论文或许开始涉及现代散文体式与语体（如游记、序跋等，如闲话风、独语体、“杨朔体”等）研究，尝试运用现代叙事学文体学方法，但文类研究的自觉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还很不够。这或许表明，在中国散文研究领域，散文的文类意义总是不证自明的。现当代散文理论发展中种种不平衡或缺失十分明显，如理论流派未及繁荣或构成理论体系即被中断；学界和出版界对西方随笔的理论译介尚属零星和片断，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者面对中国自身的散文理论资源和优良的文论传统，如何继承发扬或实现其现代性转换，更有执着的关注。

现代散文理论的困境也表现在，它至今仍然在“什么是散文”“如何定义散文”的问题上争论纷纭。这并非仅仅是概念界定的问题，“散文”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是与人们对散文写作主体、主题以及散文文类文体性质的界定相关联；同时，“散文”的内涵与外延至今也仍然在不断地变化着。中国文学史中，文学的分类体制严整分明，文论家们多以厘清各种文体特征为己任：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习惯于分体而论，《诗》、《骚》、词、曲，虽



都是广义的诗歌，但人们往往分而治之，分体、分时代、分流派，避免了一锅煮；对中国散文，古文文体复杂种类繁多，因此也特别讲究规范，刘勰论文未尝不是如此。在六朝，“文笔说”颇流行，《文心雕龙》中也使用过，但刘勰并不专篇论文、论笔，因为以文、笔论之必然杂乱，故置而不论。《文心雕龙》中有“杂文”篇，实际上是论那不好归类的文体，因为“杂文”本身还不是独立自足的一种文体。再如那风行二百年的《古文辞类纂》，郁达夫说它“曰论辩，曰序跋，曰奏议……一直到辞赋哀祭之类”，“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感激涕零的理由，一半虽在它的材料的丰富但一半也在它的分门别类，能以一个类名来决定内容”。^①但是，当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古代的杂文、随笔、散文，与现代文学中的杂文、随笔、小品文、散文等，就不再是能够严丝密缝地吻合的文体概念了。这样，我们才会对二十世纪初期一批试图用西方文学史标准来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致以“同情的理解”：他们面对中西双方不同的文学分类时，相当困惑且难以操作，“欧洲文学史皆小说戏曲之史，其他论著书疏一切应用之作，皆不闲入”，倘若如此，五经，诸子，史传这些中国文学中的正宗，岂不是要划出文学史外？自古称文宗的唐宋八家又怎么不是文学了呢？直到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怎样拿散文韵文、叙事议论的概念，来归纳《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使两套名称达到有机的互换”

①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引自《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俞元桂等选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443～444页。